

论阿尔布都的东干文小说创作

常文昌

(兰州大学,甘肃 兰州 730000)

摘 要:中亚东干文学史上的双子星之一的阿尔布都的小说创作,在整个世界华语小说中是独特的。他的小说具有东干文化的“百科全书”性质。他的创作题材多样,涉及东干人社会、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,内容悲喜兼备。对于本民族的文化,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意识。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丰富生动,语言鲜活,具有相当的典范性。

关键词:阿尔布都;东干文学;世界华语小说

中图分类号: I106.4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2-6924(2009)04-103-107

阿尔布都与十娃子可以称作是中亚东干文学史上的双子星。十娃子是公认的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,同时又代表了东干诗歌的最高成就。而“阿尔里·阿尔布都在吉尔吉斯斯坦多民族文学中,在东干文学中留下了优秀的文学遗产,他在东干散文中所占的地位,相当于亚斯尔·十娃子在诗歌中的地位。”^{[1](P62)}这里的“散文”,是同诗歌相对应的概念,主要指小说。

在世界华语文学中,阿尔布都的小说独特的。他用东干文(即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)创作小说,以东干话(即以中国西北方言为主体,又融入俄语、阿拉伯语、波斯语、突厥语借词)为叙述语言,全方位地展现了前苏联时期东干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、文化心理、民俗画卷,从中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在中亚的特殊语境中如何传承与变异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阿尔布都的小说不仅具有东干文化的“百科全书”性质,同时也是世界华语小说的奇葩。

阿尔布都的生活经历为其创作奠定了基础。作家少年时期,父母离异,他既不愿随母亲同继父生活在一起,也不想跟父亲与继母过日子。于是

便漂泊流浪,栖身在亲戚的马车店,这儿有往来于威尔内(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)与比什凯克(吉尔吉斯斯坦首都)、江布尔、塔什干(乌兹别克斯坦首都)之间的马车夫,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。后来去阿拉木图上学,眼界更为开阔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,阿尔布都应征入伍,赴列宁格勒前线,经历了德寇对列宁格勒 900 天围困封锁的血与火的考验。复员后当教师,随后又从事编辑工作。丰富的阅历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。

同其他东干小说家相比,阿尔布都创作题材更为多样,既有以家庭日常生活为主的生活小说,又有反映重大题材的社会小说;既注重开掘现实生活,又不忘东干人的历史;既有喜剧,又有悲剧;短篇之简洁,中篇之细腻;人物形象之多样,性格之个性化;语言的杂糅融汇与生动幽默,都证明了作家非凡的艺术才能。作为东干语言大师,阿尔布都将东干民间口语提升到艺术化的高度,充分显示了西北方言的艺术魅力,在世界华语文学中开辟了一条俗白语言创作的道路。

作者简介:常文昌,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东干文学研究。

一、悲剧艺术与喜剧艺术

《三娃儿连莎燕》是阿尔布都短篇小说的代表作,也是东干文学中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悲剧。小说是否具有真实的生活原型,无从考证。但作者在他的中篇小说《老马夫》中,就有三娃儿与莎燕完整的爱情故事构架。从《老马夫》中 500 多字的故事到《三娃儿连莎燕》14000 多字的短篇小说,不仅情节细致,人物性格也很鲜明。小说讲述的是旧俄时期东干乡庄的故事,莎燕是有钱人家的姑娘,长得十分漂亮,被父母关在闺房,不让出门。隔壁邻居家的长工三娃儿来掏井,与莎燕一见钟情。在一个偶然的时机,二人幽会。后来,消息传到父母耳中,莎燕被父亲毒打了一顿,服毒自杀,但始终没有供出与谁幽会。三娃儿做了奇怪的恶梦,在赶回的途中听到了莎燕自杀的消息。随后,他掘开莎燕的坟墓,将埋体(遗体)迁至新坟,殉情自杀,与莎燕死在一起。此后有人看见东方发白时,两只白鸽从坟里飞出,嬉戏追逐。当太阳出来时,便消失了。东干文学批评家法蒂玛说:“当你读着这篇小说时,眼前出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形象。”^{[12](P84)}把《三娃儿连莎燕》比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笔者以为这篇小说更像中国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东干作家是了解梁祝故事的,十娃子在他的小说《白蝴蝶》中就讲述了中国的梁祝故事。《三娃儿连莎燕》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不仅在爱情的坚贞上相似,结局也颇为相似,梁祝双双化蝶,而三娃儿与莎燕则化为白鸽。这种结局,以美丽的想象表达了中国人和东干人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愿望。《三娃儿连莎燕》塑造了莎燕的美好形象,一方面歌颂了男女青年为婚姻自由所做的抗争与牺牲,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扼杀人性的封建家法与观念,反映了东干人迁居中亚后所保留的封建落后思想。从艺术价值看,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。

阿尔布都的另一篇小说《丫头儿》中有这样一个悲剧情节:一场冰雹过后,孩子们发现鸟巢里躺着一只鸟儿,已被冰雹砸死,翅膀伸展着。孩子们正在犯疑,它为什么不藏起来躲避冰雹?突然发现,它的翅膀底下有三只雏鸟,发出吱吱的叫声,

想吃东西,而死了的母鸟嘴里还衔着蚂蚱。作家描写了惊心动魄的一幕,这是关于生命与死亡价值的思考。一只鸟儿的死亡,竟如此悲壮,放射出巨大的美学力量。这样的情节同屠格涅夫《猎人笔记》中为救小麻雀而勇敢扑向猎狗的老麻雀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阿尔布都不仅创作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小说,也创作了不少幽默喜剧小说和赞美喜剧小说。他的《电视机》是一篇滑稽可笑的喜剧小说,丈夫和别人的妻子去剧院,他的妻子坐在家里看电视,当她转换频道时,突然在银幕上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,仔细一瞧,原来是自己的丈夫,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是他的情人……

丈夫回家后,给妻子编造了一套谎言,证明自己清白无辜。这时妻子讲述他在什么地方,和谁在一起,揭穿了他的谎言,使丈夫十分惊讶。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电视银屏上看到的,便开始憎恨电视机。伊玛佐夫指出,小说发表时,正是电视机刚刚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,使读者感到特别贴近与亲切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“虚构性与真实性在作品中结合的如此天衣无缝,戏剧性与滑稽可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”。^{[1](P24)}正如伊玛佐夫所说,虚构与真实的结合是阿尔布都幽默小说的特点之一。同类作品还可以举出《没认得》(没认出来),在不到 3000 字的篇幅里,写活了一个喜剧人物达乌尔,这是一个好色之徒,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漂亮女人,便神魂颠倒,想入非非。主动邀请漂亮女人进馆子,并请求送她回家。一进门,看见熟悉的罗马尼亚餐具橱柜,听见熟悉的名字,知道糟了,他追逐调戏的这位漂亮女人,不是别人,正是离异了的前妻,于是狼狈逃跑。虚构性是很明显的,有点近于西方的荒诞小说。这篇小说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动作、语言、外貌,再到作者的叙述语言,都被赋予强烈的喜剧色彩,充满讽刺意味。阿尔布都为东干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栩栩如生的喜剧形象。

赞美喜剧有《成下亲弟兄哩》(成了亲兄弟),不同于幽默喜剧的批评讽刺意味,赞美喜剧是歌颂美好的思想品德。小说讲的是两个不同民族家庭误换小孩的故事,乌兹别克少妇与俄罗斯女人

在同一个产房生孩子,俄罗斯人的床位靠太阳,嫌热,乌兹别克人主动与她换了床位,把方便让给别人。导致孩子出生后,弄错了父母。一直长到十一岁,才搞清弄错的原因。乌兹别克人找到俄罗斯人,两家的孩子和父母感情都极其复杂,处于两难的境地。孩子与父母感情的决定因素中,是生育重要还是抚养重要?面对将一个完整过程分割开来的难题,谁都觉得束手无策。如何解决这一矛盾?最后两家达成共识,一个妈妈两个孩子,一个孩子两个妈妈,以圆满的结局,满足了作品中每个人物的感情需要。这不仅是两个家庭,也是两个民族和睦相处的赞歌。

二、民族自我批判意识与民族传统继承

作为一个优秀作家,阿尔布都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,也不是民族保守主义者。他对民族传统有清醒的认识——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必须发扬光大,传统中的糟粕必须剔除,同时还要接受新科学与新文明。东干作家都有一种自觉的民族责任感,既要继承民族传统,又要发展东干文明。

阿尔布都的小说所体现出的民族自我批判意识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与批判,《三娃儿连莎燕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;对传统陋习和愚昧迷信的批判,如《黑石头》讲述长工杨明,外号苦豆子,为找主人家的马,冻了一夜,回到家里发高烧,待退烧后,昏迷入睡。妻子看他脸色苍白,脚手冰凉,叫来邻居,都以为他死了,将他停放在地上。杨明身子动弹了一下,按传统习俗,埋体动弹,就是罪孽大。于是,人们把黑石头压在他身上,杨明再也没有喘过气来;对旧规程的批判,如《老规程》反映了东干人“行情”过多过滥,不堪重负。娶媳妇、出嫁女儿,请客送礼,尚能接受,但连过满月、行割礼、迁新居等事无巨细都要请客送礼,就弄得东干人人不敷出了;还有对经堂教师吾斯塔的批判,如《毛苏尔的无常》,写毛苏尔刚刚病愈,去经堂上学,遭到吾斯塔残酷的毒打与体罚,致使其死亡。阿尔布都也有对重男轻女观念批判的小说,如《丫头儿》说的是一家东干人,没有儿子,给丫头儿取男孩子的名字,叫穆

萨,穿男孩衣服,戴男孩帽子。可是一起玩耍的男孩嫌她柔弱,看不起她。下过冰雹之后,他们发现伏龙雀被冰雹砸死了,翅膀下有几个雏鸟。于是大家约定,轮流捉蚂蚱喂雏鸟。可是一伙男孩中,没有一个践行自己的诺言,而穆萨怀着女性的善良和母爱,天天去山上,将雏鸟喂大,令男孩子们敬佩不已。

另一方面,作家又通过小说表达了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愿望。东干人迁居中亚后,没有被周围的民族所同化,而是继承和发扬了本民族的传统,使东干人能自立于中亚一百多个民族之林。阿尔布都的小说差不多全景式地反映了东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首先是对东干民族精神的弘扬,他歌颂了回族起义领袖白彦虎、东干骑兵团首领马三成、苏联英雄王阿洪诺夫。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了东干人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,同时也体现了民族传统和道德风尚。如《老英雄的一点记想》,借人物之口批评如今的年轻人,只把抓筷子,吃稻面(拉条)学下了,而忘记了东干民族的根本传统。而马三成却能用东干人的民族传统和团结友爱精神,将1200人的骑兵团调养成威震中亚的铁骑。其次,对东干传统道德的褒扬。中篇小说《老马夫》中写一个东干农民拉合曼在卫国战争最困难的时期,为救饥饿儿童,偷偷宰杀了同村老汉的牛娃。伊斯兰一贯反对盗窃,但将饥荒与一般年景加以区别。十几年过去了,拉合曼心里过意不去,受到道德鞭子的抽打,最终买了一头母牛带牛犊,向老汉认错,并请求放赦。这是合乎伊斯兰传统道德的,作者对其加以赞扬。短篇小说《随便的便宜》中,弟弟“过事”,只打算收礼,不愿好好待客,请一个奸诈的管家蒙骗客人,甚至打算把小孩吃剩下的抓饭倒到锅里,搅和在一起,重新端给客人。而哥哥重义,重“仁礼待道”,重影响,批评弟弟:“钱也要紧,脸也要紧,你光念钱哩,脸往哪儿藏?”以东干人传统的道德观念处理义与利的关系。阿尔布都作为东干人的精英,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作品中,都始终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,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。

三、女性人物形象

东干小说创作中,阿尔布都小说中的人物不

仅个性鲜明,还丰富多样,他在东干人物的艺术画廊中,创造了史诗般的艺术形象。在东干族一百多年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找出相应的人物形象。他的人物形象系列,粗略的归纳有以下几种:英雄形象系列,包括东干民族领袖白彦虎,东干骑兵团首领马三成,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英雄王阿洪诺夫等;讥弄型形象系列,如《没认得》中的达乌尔、《电视机》中的丈夫、《随便儿的便宜》中的胖布拉儿等;理想人格型形象系列,如《老两口》中的杨大哥、《老马夫》中的老马夫;女性形象系列,从补丁老婆到聪花,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物。此外,还有保守的、先进的、愚钝的、机灵的等各类人物形象。限于篇幅,这里仅就女性形象系列稍作分析。

首先,美好的青年女性形象。现实生活中,女性往往争取不到与男性同等的地位,尤其在旧时代女性更受歧视。可是在东干民间文学中,女性形象却往往光彩照人。^[4]东干小说也创造了动人的女性形象。阿尔布都的《三娃儿连莎燕》里的莎燕,摈弃门第观念,爱上了邻居家的长工三娃儿,当秘密泄漏后,为了保全三娃儿,她忍受毒打,至死没有供出他的名字,作者将为婚姻自由献身的女子写得十分感人。《头一个农艺师》里的聪花则是理想的新式东干女性,她有知识,不仅在家庭发挥了重要作用,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。作品着力描写她在科学实验中的作用,改变了水稻的生长期,被保送到莫斯科农业大学去深造。《婚事》里的麦姐儿,在作品过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才出场,人物语言虽不多,却很有主见,很有力量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她依靠新时代的政权,以新文明新思想战胜了传统的习惯势力。在聪花和麦姐身上,可以感受到新女性所代表的精神力量。

贤惠的老一代女性形象。《补丁老婆》里的补丁老婆,以缝补衣裳而出名。在要补的衣服口袋里发现金坯儿,如数奉还。《头一个农艺师》里的聪花奶奶,虽然不懂政治,差不多生活在政治生活之外,但对宗教习俗却相当熟悉。她深明大义,为人贤惠。《老两口》中杨大哥夫妇非常和谐,老伴不仅对丈夫体贴入微,同时在处理女儿与女婿的矛盾上,也通情达理。女儿为了孝敬父母,给他们

100卢布。他们本想把钱还回去,又怕女儿多心。不料,这是女婿准备买牛的钱,为此,女婿女儿打了一架。儿子听到这消息,要质问姐夫,杨大哥不让去,叫老伴把钱还给女儿,从而化解了矛盾。这类贤惠的老一代女性身上,带有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。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。

表面时髦,内里空虚的青年女性。《惯道下的》(即娇惯的)写一位姑娘着装时髦,冬天人造虎皮大衣,水獭帽子,靴子放光,皮包发亮。热天,一身新西装,戴墨眼镜,搭遮阳伞,一天一换衣。洒香水,染指甲,怀里抱一条小狗。是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,中途辍学,不务正业。上车不给老弱病残让座,羞于父亲收皮子的职业。生活在前苏联,这样的俄罗斯着装不足为奇,而作者对这类只求外表,不注重修养的时髦女性持批判态度。

蛮横无知的女性形象。阿尔布都笔下的这类形象,或蛮横无理,或无知自信。前者如《贱溜皮》,丈夫费了好大劲,买了两张哈萨克艺术团音乐会入场票,想到妻子会高兴的。不料,回到家里不但没有讨好,还招来妻子陈谷子烂芝麻的数落与抱怨,最后错过了时间,将票撕掉。后者如《下场》中的姬哈子、《后悔,迟了》中的白姐儿,在教育孩子上,糊里糊涂犯了错误。白姐一味让孩子吃好的,多吃,致使孩子得了肥胖症。这些都是生活小说,通过普通的日常生活,塑造人物性格。

在对阿尔布都女性形象的梳理过程中,我们发现他的传统女性、时髦女性、蛮横无知女性同老舍的传统女性、新潮女性及悍妇型女性具有可比性。阿尔布都受俄苏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,受东干民间文学(母体是中国民间文学)的影响也有迹可寻,但是否受中国现代某些作家的影响,尚需进一步研究。但阿尔布都曾将鲁迅与老舍的俄文版小说选译成东干文,可见他对这两位中国作家的心仪。

四、独特的语言

在世界华语文学创作中,不仅东干文字是独特的,东干语言也是独特的。东干语以西北方言为主体,科技政治等领域的俄语借词颇多,伊斯兰宗教文化领域的阿拉伯语、波斯语借词较多。小

说语言的构成较为复杂,不仅保留了晚清时期的旧语汇,同时也有现代汉语中的新词汇,还有俄语、阿拉伯语、波斯语及突厥语借词。同一篇小说中,汽车与阿夫多布斯(俄语汽车)交叉并用。东干语又分甘肃方言与陕西方言两种,而书面语言基本是甘肃方言。东干学者杨善新提供的托克马克陕西方言故事中,有“了”字出现,而阿尔布都的小说如《婚事》,没有一个“了”字,凡用“了”的地方,统统写成“哩”。就连“陕西村”营盘的作家白掌柜的小说,也多用“哩”,而不用“了”。这一点,被很多研究东干语言的人所忽略。

阿尔布都的小说语言在东干文学中具有典范性,他将西北方言为主体的东干语提升到艺术语言的高度,给我们带来惊喜。如《真实的朋友》开头按现代汉语译成“炎热的夏天,莫斯科喀山火车站人如潮涌”。东干原文直译为“五黄六月,莫斯科喀山火车站上的人丸圪塔的呢”。“人如潮涌”陈陈相因,没有什么新鲜感,而“丸圪塔”却在书面语言里很少见到,给人以新颖生动的感觉,倒符合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“陌生化”效果。又如《扁担上开花呢》说一瘸一拐的残废人“送的哪一朝的埋体?”《婚事》中哈三子问即将结婚的女婿,“明儿过事呢,今儿你跑到我的门上,看的哪一朝的麦姐儿?”这里“朝”字用得特别好。不能或不该做的事,却要违背常规去做,正如人们讥讽“张飞打岳飞”是朝代的错误一样荒唐可笑。如果换成“送的哪一家的埋体?”和“看的哪一家的麦姐儿?”艺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。由此可以体会到其作品的语言魅力。

阿尔布都的小说,除了极个别的外,几乎全是写东干乡庄生活的人和事。在叙事视角上,完全是农民的叙事视角,以农民的感受来观察事物,加上叙述语言(也是东干农民的语言)与人物语言的和谐统一,从而构成了他小说语言的独特景观。以时间感受为例,阿尔布都写火车站买票,不以城市人的几月几号为时间标志,而说“五黄六月”,“五黄六月”与农时有关,是收割小麦的季节,这正是农民的视角。阿尔布都的这种叙述视角,也影响了其他东干作家,如曼苏洛娃的《红大炮》开头也是“五黄六月,我到哩乡庄”。又如阿尔布都的

《惊恐》写东方发亮,李娃起来,背上笤帚和辣面,“热头一竿子高”,到了街上。不说八九点钟,而说日头一竿子高,这种直觉感受的叙述方式,也正是农民的视角。农民的叙述视角还表现在近取譬上,许多譬喻都是近取诸身,借用农民身边的事物作喻体。《老马夫》说仗打罢,“光阴紧的拧绳绳的时候……”及《后悔,迟了》中“指甲盖子大的雨点子”,都是近取譬。在整个东干小说比喻系统中,近取譬占有突出的地位。

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还有,东干小说中留存的晚清语言。《真实的朋友》中小伙子向亚古尔借钱说“借三个帖子”,即借三个卢布。中国的年轻人已不知“帖子”是什么,东干人把几块钱,叫几个帖子。中国旧时以金银或铜钱为货币形式,到了洋务派发行纸币,叫帖子。东干人把飞机叫飞船,高射炮叫天炮;男老师叫师父,女老师叫师娘;学校叫学堂,教室叫讲堂。这些都留有语言化石的痕迹,就语言的活化石看,东干语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。

在阿尔布都小说中,有许多旧词新用的例证。《头一个农艺师》中,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,东干人纷纷打报告要求参军,作品中的人物求别人替他写报告,却说成你帮我“写个状子,给大人递上去”。“状子”的词义扩大了,“大人”(上级)沿用旧称。阿尔布都的小说还引用了不少谚语俗语,东干人称口歌口溜,这些代代相传的谚语俗语,主要来自中国,有的稍加改造,更加伊斯兰化。

[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“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文支——东干文学定位”(项目编号:03JB750、11-44010)的阶段成果]

参考文献:

- [1]伊玛佐夫·阿尔里·阿尔布都[M].(俄文版)比什凯克,1997.
- [2]法蒂玛·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[M].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,1984.
- [3]苏尚洛.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[A].东干人的历史与民族学概述[M].郝苏民,高永久译.宁夏:宁夏人民出版社,1996.
- [4]常文昌.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[J].贵州社会科学,2008(7).

[责任编辑:郑迦文]